

# 互证以求真

## ——试谈《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之史料运用

□ 董少新

(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3-0079-03

蔡鸿生先生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虽然是一部“早孕而难产”的著作,但正因为如此,它堪称是近年国内史学著作中的“罕见珍贵儿”。在这部“谈胡说番”的作品中,蔡先生精益求精,以卓越的才识,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使得一部不到三百页的著作,给人以厚实之感。

季羨林先生在《序》中有云:“他(蔡先生)使用资料必求其完备详实,论证方法必求其周密无隙。”这既是对蔡先生治学态度的高度评价,也是对蔡先生书中一贯恪守的互证原则的客观评价。本文试就蔡先生此部著作中史料运用的互证原则,谈谈自己粗浅的学习心得。

蔡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所运用的文物史料,包括古城遗址、墓志、碑刻、古钱币以及各类出土文物;文献史料包括中国历史文献(如正史、政书和相关专著等)、外国文献(如俄文、英文、法文、日文乃至粟特文、突厥文等文献)和佛教经典。这些史料相互比勘与参证,构成了《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的史料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文献处于中心地位。文物和诗文均要与文献记载互证,在证明文献记载属实(有时是证伪)的同时,强化了对历史真实的阐释。只有在文献失载的情况下,才只用考古材料或诗文材料来证史。

文献材料是治史者的主要参考。但是,对于历史的方方面面,文献失载或记载错误、以讹传讹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的。如果文献上的记载,能够有文物的支持,那么此则记载就几近于真了。中国传统史学对文物证史一向重视,并有金石之学。陈寅恪在《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中说:“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文物证史的范围愈来愈大,重要性也更加突出。蔡先生在《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使用了大量的文物史料。几乎在每一个问题的论述中,都有文物和文献两方面的证据。如果缺少物证或文献失载,则一一指出。

例如,在论述突厥社会家庭状况时,

蔡先生首先引用了恩格斯关于游牧人中心父权制家庭出现的历史条件的科学论述,再考察突厥社会的具体情况。通过《太平广记》中有关记载和考古资料石制磨盘的互证,证明突厥妇女已沦为“操劳家务”的从属地位了。接着通过《隋书·突厥传》、《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载和《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碑文记录,分析突厥家庭的亲属观念,不但证明了突厥社会中存在母权制的残余,而且印证了恩格斯“母权制的遗迹直到中世纪后期也还被发现”的科学论断。接下来引用新、旧唐书的有关记载,用实例证明突厥社会贵族妇女可敦“参政”的习俗。最后再利用《旧唐书》、《巴尔立克二号碑》及《新唐书·突厥传》的记载,证明突厥社会中存在着收养制和寄养制等母权制残余。通过以上文物与文献的反复论证,最终得出了6至8世纪突厥家庭的本质和特征:“它是带有大量母权制残余的父权制家庭。”这样的论述所得出的结论更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令人信服。

在将出土文书、碑刻等文物资料与文献进行互证时,蔡先生十分重视当时的译例。根据当时的翻译通例来考察文献记载与文书、碑刻记载,对考史,尤其是“正名”,十分重要。例如,关于康国祆教的记载,《隋书·康国传》称“有胡律置于祆祠”;《经行记》和《太平寰宇记》称神祠为“拔”或“跋”。对此,前人如丁谦、王国维、白鸟库吉等都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均未令人满意。蔡先生根据 Ferghana 译作“拔汗那”或“跋贺那”这一隋唐译例,提出《经行记》和《太平寰宇记》中的“拔”或“跋”似可求之于 wnty' nk'v' st' ny 的第一音节。这样就向“祆”、“拔”的更近于真的解释,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蔡先生运用的诸多文物史料中,

有一类值得特别注意,就是古代图画。图画的艺术表现形式是艺术史的研究范畴,但其所表现的内容,却为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线索。蔡先生在以图证史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仅在上编就运用以图证史十多处,有片治肯特壁画、敦煌石窟壁画、出土石皿刻绘画等。例如,书中第36页,蔡先生运用敦煌第45窟的一幅画,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一段记载互证,说明脱离商队的胡商所面临的风险与威胁。

互证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是诗文与文献的互证。引诗入史,宋代即有,而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以诗证史、以史释诗,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陈氏以诗证史之法在蔡先生这部著作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书中引用了大量诗歌,仅上编就引有三十余首。此外,全书还引用过词、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以达证史补史之目的。这些都体现了蔡先生“向集部进军”的主张。

在《九姓胡丛考·服饰》一节中,蔡先生首先引用《全唐诗》中刘正言的一首《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从中概括出胡服的整个形制:“帽、衫、带、靴”。然后按此顺序,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逐项分析胡服结构。类似的例子还见于《九姓胡的贡表和贡品》一章,引《全唐诗》鲍防《杂感》一诗,从中引出贡道、贡期和贡品三大问题,然后再运用文物、文献和诗文等材料,对此进行逐一讨论,融诗于史,诗史一体。在讨论胡贡郁金香时,用《说文》、《本草纲目》来证明其宗教用途之外,又先后引用了李白、段成式 and 花蕊夫人的诗歌,来说明郁金香在酿酒、香衫和世俗礼仪方面的用途,使人读史与赏诗同步,犹如品味郁金香之香。

陈寅恪治史重视共性真实与个性真实的分析。一则史料,不能因为个别地

方记载错误,就将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通篇虚构而一概抛弃。而要作具体分析,从“假”中分析出真实来。蔡先生这部著作中,对史料一贯采取谨慎分析的态度,通过互证,去伪存真。例如,书中第 21 页,蔡先生对敦煌文书伯希和 3813 号一则胡商判例的分析,指出尽管其出自虚拟,并无个性之真实,但其中却反映了九姓胡作为商业民族的特殊性格,具有共性之真实,故仍不失为珍贵的社会史料。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作为史料,也是因为文学作品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背景,蕴涵着共性之真实。例如,蔡先生用《红楼梦》贾府门前那对石狮子作为狮在华夏家族化的一个例证;用晴雯、秋纹众丫头讥嘲一副媚骨的花袭人为“西洋花点子哈巴儿”这一情节,更生动地描绘了“通晓百戏”的哈巴儿的狗态。在上编《贡品类释》一节中,蔡先生用北齐志怪小说中的一段文字,来证明髹髹较髹髹工艺更为上乘。在《“饽饽”及其汉化》一节中,蔡先生用元剧《琵琶行》中以“米皮饽饽”充饥这一情节,来说明胡食饽饽已成为中华饮食文化中的一分子。对于史料短缺的研究领域,从集部发掘出的史料宝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在寻求史料中的另辟蹊径,对史料学本身亦意义非浅。

中外史料的互证是此部著作互证原则的又一重要方面,书中使用的国外材料,占有所有使用材料的一半左右。这也体现了蔡先生“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的治学眼界。

在中编《突厥事火和拜天》一章中,蔡先生首先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一段记载,与拜占廷史家狄奥菲拉特《历史》中的一段著录相印证,来说明“突厥事火无庸置疑”。在探求突厥事火起源过程中,首先通过对《周书·突厥传》记

载的突厥祖先之传说深入分析,寻出两条线索:到“索国”后裔的宗教迷信中寻找突厥时代信仰的遗存;从“突厥”一词的语义构成中挖掘“火”的因素。接着运用波塔波夫、伊凡诺夫和科诺诺夫等人在民族学、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拨开文献的云雾,把神话分解为历史”,得出了“突厥人拜火之俗,有它自己的起源史”这一崭新结论,相对于白鸟库吉所断言的“突厥事火是通过中亚昭武九姓向伊朗学习的”之说,蔡先生的结论更能反映历史真相。

陈寅恪曾郑重指出“吾国史乘”重考胡姓而忽略胡名。半个世纪以来,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改变。而国际学术界对粟特人名的研究已有长足进展。针对这种情况,蔡先生在探讨“胡俗”中之“胡名”时,先后借鉴和采择了蒲立本、里夫什茨、哈马塔、高本汉、亨宁、韦伯、拉德洛夫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爬梳穆格山粟特文书和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及中国文献,将其中胡名进行比勘研究,使中国的胡名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陈寅恪在评价王国维学术成就时说:“然洋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可见,无论是王国维还是陈寅恪,对互证这一史学原则,都非常重视。而蔡先生在《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一书中所一贯坚持的互证原则,无论是在史料种类上还是在互证形式上,对互证原则都有所发展。

蔡先生所研究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这一课题,本属冷僻,资料极难收集。但是在蔡先生这部研究成果中,

# 论当代西方国家思想道德教育方法

□ 郑永廷

(中山大学理论部教授、博士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关键词]当代西方国家 思想道德 教育方法 方式 特点

[摘要]西方的思想道德教育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到 19 世纪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同宗教紧密结合而以宗教为手段,19 世纪到二战期间是权威教育起主要作用,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则受杜威、皮亚杰、哈特肖恩、霍尔等多个教育学派和学科的影响。因而,当代西方的思想道德教育形成了不同于东方的许多特点,如宗教方法的传承、学科方法的多样、教育方式的渗透、选择方法的自由,并形成了道德认知发展、价值澄清、社会学习等主要的理论。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26(2000)03-0082-06

## 一、当代西方思想道德教育特点

### 1、宗教方法的传承性

信奉宗教,一直是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伦理与宗教结合也一向是西方国家道德教育的特点。进入 20 世纪之后,虽然西方国家改变了宗教教育的主导地位,大力进行世俗道德教育的探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西方道德教育就

是以反对宗教教育,促进道德教育世俗化为特征的。然而,在西方,宗教与道德毕竟有血肉联系,正是基督教最初规定了道德的基本准则,确立了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宗教教育也即道德教育。随着资产阶级民主的不断扩大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宗教与民主、科学发生了剧烈冲突,一方面,宗教受到了批判和限

仅尾注就有六百余条;若将书中已注明出处之材料也包括在内,则所引材料估计不下八九百条。著作中每一个小问题都有相当的史料支持。苏联史学家 E. M. 茹科夫曾说:“历史研究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史料不限于一种(如考古发掘的结果,文献的利用,等等),而是使用了提供互相补充的信息的各种史料的总和。要把与某个过程或事件有关的史料配合在一起,这种配合越是广泛,越是形式多样,研究者的结论便越可靠。”蔡先生以雄厚的史料基础,保证了整部著作结论的可靠性。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第 1 版第 230 页。

原著第 88、118 页就有两例。

蔡先生曾在学术报告中强调,在“经、史、子”向为史家所重的情况下,要注重“集部”的开发,到“集部”中寻找史料。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稿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19 页。

E. M. 茹科夫著,王瑾译:《历史方法论大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第 1 版第 206 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